Habitu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Field: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of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Xiamen City

Haoyuan Xiang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owloon, Hong Kong SAR
(hxiang5-c@my.cityu.edu.hk)

Abstract—This article, using Pierre Bourdieu'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who are study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Xiamen city of Fujian province, aims at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ir current education condition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mainly deals with the specific form, objective form, and institutional form of cultural capital as well as the habitu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Finally,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cultural capital owned by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s not correspondence with mainstream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school educational field; they have difficulties in generating and accumulating adequate cultural capital; and also there are big discrepancies between public school and private school, moving across provinces type and moving across countries type, in terms of education condition.

Keywords—educational field, habitus, cultural capital,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education condition

教育场域中的生存心态与文化资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研究

向浩源

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九龙，香港，中国

摘要 本研究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教育场域”中“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和“生存心态”角度，对厦门市湖里区初中在读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农民工子女在“文化资本”上呈现出较为弱势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固有的“文化资本”与学校主流的“文化资本”不相契合，“文化资本”的生成较为困难且质量不高；从“生存心态”上来看，“学习潜力较强但学习动机并不明朗，就读不同性质学校和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状况上差异较为显著。

关键词 教育场域，生存心态，文化资本，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

1. 引言

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城市中生活和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子女教育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子女在“教育场域”内“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生存心态”的互动过程。“教育场域”视角的核心特质就在于引入并强调关系性思维，这种方式主张对教育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应当放置于一定的关系框架中 [1]。因此，本研究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从“教育场域”的研究视角对厦门市湖里区初中在读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即农民工子女在“教育场域”内

“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与“生存心态”的交互情况，研究重点放在了“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从而描述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方式进行抽样，调查时间是 2013 年 2 月至 2013 年 3 月。发放“学生问卷”、“家长问卷”各 300 份，共回收学生、学生家长有效问卷 359 份，其中有效“学生问卷”188 份，有效回收率 63%；有效“家长问卷”171 份，有效回收率 57%。本研究将两类问卷的收集到的信息导入 SPSS 21 中进行统计分析，具体采用了曼恩-惠特尼 U 检验法、卡方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多元

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

2.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2.1. 研究的核心概念

2.1.1. 农民工子女

本研究中的“农民工子女”是指随其父母或亲戚离开户籍所在地，进入城市地区学习、生活的年龄处于 12-17 周岁之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

2.1.2. 教育场域

“教育场域”(Educational Field)指的是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文化资本”的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的客观关系网络。同时，“教育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为“文化资本”和“生存心态”提供了相互竞争、比较和转换的必要场所 [1]。

2.1.3. 生存心态

“生存心态”(Habitus)在国内一般被译作“惯习”[2, 3]、“习性”[4]。本文认为，“生存心态”是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的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源泉。同时，“生存心态”也是为一种隐性的“资本”，是一种行动者所拥有和掌握的“垄断资本”，是不同于其他行动者、并决定行动者行动的一股唯一不可剥夺的力量 [5, 6]。

2.1.4.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指的是借助于各种教育行动传递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产。“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1)“身体化”的形式，指的是在人体内长期的稳定的内在化，这个过程必须耗费一定的“经济资本”和时间，最终成为一种秉性和才能，为个人所拥有，具有不可转让性，并构成了“生存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客观化”的形式，一种“物化”的状态，体现在文化物品之中，具有可传递性，“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只有通过“身体化”之后才能发挥作用；(3)“制度化”形式，是指将行动者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体制的、考试的形式正式确认，以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 [1,5,7,8]。

2.2. 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一般情况下城市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要高于农民工子女。本研究认为，把这种现象简单地归结为农民工子女的智力水平低下和努力程度不足是非常武断的。同时，本项研究认为个体在学术上的成功和失败并不是天赋能力的结果，而是其在“教育场域”内具有

的“文化资本”和“生存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资本”是和特定的“场域”相联系的，只有当人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其所处的“场域”内的主流文化相互适应、相互匹配时，才能够发挥作用。农民工子女家庭中的“文化资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生成实际上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即农民工子女原先在家庭中生成、积累的身体化、客观化、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3. 资料分析

3.1. 农民工子女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

从年龄、性别结构来看，12~17 周岁的农民工子女中，男生多于女生，男、女各占 51.1%和 48.9%。农民工家庭平均子女个数为 1.91 个，只有 1 个孩子的家庭占样本总数的 28.7%，有 2 个孩子的家庭占样本总数的 53.2%。从农民工子女来厦门的时间分布来看，居住时间 6 年以上的有 68.9%，4~6 年之间的农民工子女有 15%，因此，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子女都是属于“长期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流动类型可以分为跨省流动、省内跨县流动两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子女占 53.3%，省内跨县市占 46.7%，农民工子女以福建省内区域间流动为主，来自福建外的农民工子女主要来自于江西(13.3%)、四川(9.6%)、安徽(6.9%)、贵州(5.3%)、河南(4.3%)等中西部农业大省。

3.2.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

农民工对其子女期望颇高，84.8%的农民工希望子女继续读普通高中。62%的农民工希望子女能够读到大学本科学历，23.4%的农民工甚至希望子女研究生学历。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对学历的期望比在子女民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对其子女学历期望要更高($P=0.020^*<0.05$)。大多数农民工会经常和子女沟通，亲子沟通的内容有“学校的事情”(25.8%)、“学习成绩”(23.6%)、“家里的事”(13.8%)，然而对子女内心的烦恼却缺乏关注(6.4%)。

农民工子女课后活动有“参加体育活动”(6.2%)、“与同学、朋友聊天”(6.2%)、“帮助父母做家务”(13.4%)、“看电视”(12.0%)、“学习、做作业”(36.7%)、“上网、玩游戏”(4.8%)、“看课外书”(14.5%)。从家长问卷调查的数据和上述比例大致相同。就读不同性质学校、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农民工子女与课后活动类型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5$, $P=0.040^*<0.05$)。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体育活动”、“学习、做作业”、“看课外书”的比例要比来就读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多。而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帮助父母做家务”、“看电视”、“上网、玩游戏”的比例要比就读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多；来自省内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体育活动”、“与朋友聊天”、“学习、做

作业”、“看课外书”的比例要比来自省外的农民工子女多。而来自省外的农民工子女“帮助父母做家务”、“看电视”、“上网、玩游戏”的比例要比来自省内的农民工子女多。

就课外阅读书籍的类别而言,主要有“中外名著”(21.5%)、“文学杂志”(22.9%)、“漫画、消遣类杂志”(16.3%)、“青春文学、网络小说”(18.6%)、“新闻报纸”(10.2%)、“学习类报纸”(7.0%)、“平时不怎么看课外书”(3.4%)。就读不同性质学校、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农民工子女与课外阅读书籍的类型均存在显著的差异($P=0.003^*<0.05$, $P=0.040^*<0.05$)。来自省内的农民工子女阅读“中外名著”、“文学杂志”、“青春文学、网络小说”、“新闻报纸”的比例要比来自省外的农民工子女多。而来自省外的农民工子女阅读“漫画、消遣类杂志”、“学习类报纸”、“不读课外书”的比例要比来自省内的农民工子女多。就读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阅读“中外名著”、“文学杂志”、“新闻报纸”、“学习类报纸”的比例要比就读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多。而就读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女阅读“青春文学”、“网络小说”、“漫画、消遣类杂志”、“不读课外书”的比例要比就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多。

3.3.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主要体现为农民工子女家庭的藏书情况和农民工子女对零花钱的支配情况。笔者发现就读不同性质学校与家庭藏书情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3^*<0.05$)。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藏书要比民办学校种类更丰富且更适合阅读。农民工子女中“经常去”学校图书馆看书的有 11.8%，“有时去”的有 38%，“很少去”的有 22.5%，“从来不去(包括学校没有图书馆)”的有 27.8%。就读不同性质学校和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农民工子女与到学校图书馆看书情况之间差异显著($P=0.000^*<0.05$, $P=0.003^*<0.05$)。来自公办学校、省内的农民工子女去学校图书馆看书的频率要高于来自民办学校和省外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每月零花钱的主要用途有“买零食等食品”(29.6%)、“买漫画、青春文学等消遣类杂志”(13.7%)、“买教辅书等学习用品”(28.0%)、“上网吧、打游戏”(4.0%)、“买中外名著”(11.2%)、“买文学杂志”(13.4%)。就读不同性质学校、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与每月零花钱的主要用途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3.4. 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农民工的学历普遍较低,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母亲的学历要低于父亲。父亲的学历分布为“小学及以下”(18.7%)、“初中”(55.1%)、“高中”(21.9%)、“大专及以上”(4.3%)。母亲的学历分布为“小学及以下”

(45.7%)、“初中”(38.7%)、“高中”(13.4%)、“大专及以上”(2.2%)。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父亲的学历比在子女民办学校就读的父亲的学历要更高。受访的农民工主要从事于生产型和服务型的职业,父亲从事职业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企业打工者”(19.5%)、“建筑、装修工人”(17.8%)、“运输工人”(14.1%);母亲从事职业的前三位分别是“企业打工者”(31.4%)、“没有工作”(19.5%)、“小商贩或是做小生意的”(11.9%)。农民工子女希望从事职业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公务员”(19.2%)、“企业管理人员”(19.2%)、“教师”(17.6)。根据卡方检验,发现农民工子女的父亲从事的职业与农民工子女的职业期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0.05$)。

3.5. 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心态”

农民工子女的烦恼主要有“学习成绩不好”(42.4%)、“和同学关系不好”(11.8%)“朋友很少”(12.2%)、“与老师关系不好”(5.7%)、“家庭不和睦”(8.6%)、“没有烦恼”(19.2%)。就读不同性质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与烦恼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25^*<0.05$)。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家庭不和睦”、“朋友很少”、“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要比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高。

58%的农民工子女不认同“学习成绩不好会被人看不起,成绩好能赢得别人的尊重”,67.7%的农民工子女也不认同“学习成绩好,证明我比别人强”,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就读不同性质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与是否认同“学习成绩好,证明我比别人强”观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34^*<0.05$),民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不认同这一观念。

85.6%的农民工子女认为“我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需要好好学习”,66.8%的农民工子女认为“一些科目虽然不感兴趣,但是中考要考,只好硬着头皮念”,72.9%的农民工子女认同“我对各种知识有好奇心,因此想更深入地学习”。

38.7%的农民工子女认为“课本上的知识和我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差别很大”,72.2%的农民工子女认同“我在学习,经常和同学交流”,相比之下,只有 34.9%的农民工子女认同“平时我喜欢找老师答疑和讨论问题”,根据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农民工子女与是否认同“我在学习,经常和同学交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24^*<0.05$),也就是说,在学习上,来自省外地区的农民工子女更喜欢与同学交流而不是老师。

3.6. “文化资本”与“生存心态”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不同性质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在数学和英语成绩上存显著差异, P (数学)

=0.000*<0.05, P(英语)=0.002*<0.05; 语文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 P(语文)=0.440>0.05。来自不同流出地类型的农民工子女在语文、数学、英语成绩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 母亲的学历、亲子交流、家庭藏书情况对语文、数学、英语的成绩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1 SPSS 对于多元回归分析法生成的结果——Coefficients^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26.055	8.822		2.953	0.004
谁会辅导你的学习	3.261	1.272	0.171	2.563	0.012
家长对子女文化程度期望	3.527	1.879	0.133	1.878	0.063
子女初中毕业后的期望	3.550	1.542	0.162	2.303	0.023
家长对子女成绩评价	9.157	2.606	0.304	3.513	0.001
子女成绩自我评价	10.829	2.538	0.367	4.267	0.000
父亲的学历	2.940	1.760	0.126	1.671	0.098
母亲的学历	-1.039	1.628	-0.048	-0.638	0.525
亲子交流的时间	-2.135	1.144	-0.127	-1.866	0.065
家庭藏书情况	-1.024	0.997	-0.072	-1.028	0.306

注: a 因变量: 平均学习成绩(语文、数学、英语)

4. 研究结论

4.1.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积累的数量较少,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同样较为匮乏, 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质量不高

“场域”与“资本”的联系十分的紧密, 特定的“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场域”中才能够最有效地发挥力量。农民工多数只有初中以下学历, 所以他们并不能提供学校要求的“文化资本”, 其主要表现为学习的主动性较差, 上课过程中积极性、参与性不足, 缺乏相应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农民工没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因此, 他们对自己的子女抱以较高的期望。但是, 亲子沟通时间明显太少。农民工子女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较为匮乏, 家庭藏书少可以通过去学校图书馆借书来弥补,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经常去图书馆”的只有 11.8%。家庭藏书情况以及家庭学习环境对农民工子女的语文、数学、英语的平均成绩并不构成显著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笔者认为客观化“文化资本”向身体化“文化资本”转化还需要一定的作用时间, 只有被“身体化”之后, 才能够发挥作用。

4.2. “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存在障碍

农民工子女每月零花钱的主要被用来“买零食等食品”、“买漫画、青春文学等消遣类杂志”和“买教辅书等

学习用品”。买漫画等消遣类书籍的比例要高于中外名著和文学杂志。农民工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3000 元以下, 可见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本”同样相对不足。

4.3. “生存心态”较为复杂, 学习潜力较强, 但学习动机不明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新事物具有较强的好奇心, 对知识的学习较为渴求, 但是学习的动机并不明朗。他们对未来没有较为明确的认知和把握, 对城市生活逐渐熟悉, 而农村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陌生。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学习成绩还过得去, 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子女会选择继续就读普通高中; 如果成绩不理想, 就会选择就读职业学校, 学习一门手艺, 得过且过的心态在农民工子女中较为盛行。

综上所述, 农民工子女由于自身的“文化资本”与主流的“文化资本”并不协调, 使得“文化资本”积累起点远低于厦门本地学生。“经济资本”的匮乏阻碍了农民工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的生成以及向身体化“文化资本”的转化。他们的父母由于工作和学历的原因, 往往无暇顾及子女的学习, 他们更多是把学校当做“托儿所”, 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给了学校。从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心态”来看, 他们并不愿意重复他们父母的生活、职业轨迹, 非常希望融入当地社会, 羡慕学习成绩好的同学, 他们也相信知识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是他们并没有付出太多的行动来改变他们所处的境况。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 Q. Liu. On Educational Field,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vol 4, pp. 78-91, 2006. (in Chinese)

[2] P. Bourdieu and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ctive Sociology*, trans. M. Li and K. L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8. (in Chinese)

[3] W. J. Zhu. A Non-economical Unscrambling of “Capital”-Pierre Bourdieu’s Concept of “Historical Capit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6, pp. 117-123, 2005. (in Chinese)

[4] G. H. Zhu. Habit and Capital: Bourdieu’s Main Conceptional Tools,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 pp. 33-37, 2004. (in Chinese)

[5] D. Swartz.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trans. D. F. T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in Chinese)

[6] X. Y. Gao. *Pierre Bourdieu’s Social Theory*.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 Chinese)

[7] Q. Li. *Ten Lectures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8. (in Chinese)

[8] Y. Lin.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Drive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in Chinese)